

## 追忆丁瑜先生点滴及三部文稿的整理

程有庆

我和丁瑜先生是同事，但论起年龄和资历，却和他差着很大的辈分。丁先生早在1949年即进入北平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前身）工作，先在中文编目组，六十年代初调到善本部，是善本组的老员工；而我1984年11月才来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善本组工作，当时丁先生已58岁，我25岁。

我最初知道丁瑜先生的大名，是在即将来北图工作之前。大概是1984年10月或11月初，《光明日报》刊登了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文物鉴定委员的名单，其中有启功、朱家溍、顾廷龙、傅熹年等众多知名学者，北京图书馆善本组的两位古籍专家冀淑英、丁瑜的名字也赫然在列。因名单是按姓氏笔画排列，所以丁先生的名字位列第一，冀淑英的名字排在最后，这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我初到善本组工作时，冀淑英、丁瑜、陈杏珍三位先生正做《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纂工作，不在善本组里办公，以至有挺长一段时间，我对丁瑜先生是只知其人，未识其面。然而，我对初次见到丁先生的印象竟是极其的深刻。

那是1984年底或1985年初某个周六的下午，善本部党支部在北海老馆一号楼前厅西北角的善本阅览室召开新党员薛殿玺、黄润华转正的会议，身为普通群众的我，窃喜不需参会而可以利用时间看书去。没承想，组里有着多年党龄的邢秀珍老师要求我也参会，我推说自己思想落后，不具参会资格。不料她竟以不容商量的口气说：“年轻人都要要求上进，你一定得参会。”我初来乍到，哪敢违抗？只得不情愿地进入会场，缩在角落里旁听。

那天的会议开得十分热烈，几乎所有人都发了言。主题之外，更多的话题不自觉地涉及到回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过的那些个事情，人们各以自己的亲历，相互补充、印证着某些事情发生的过程及细节，场面非常生动。由此我一下子面识了善本部许多的人，知道了图书馆许多的事。

令我颇感惊讶的是一位老员工所做的自我批评。他深刻检讨了自己心中某些“不良”的想法，由于对私心揭示得太过彻底，真可以用那个年代常说的“襟怀

坦白”来形容，一个人当众能说出如此坦诚的话，让我感受并见识到了怎样才算得上真诚与善良。不知为什么，当时我料定这位面容慈祥的发言人一定就是自己未曾谋面的丁瑜先生。果不其然，紧接着徐自强先生的发言证实了我的猜想，他说丁瑜先生的发言使自己深受感动，并也同样坦诚的检讨了自己曾经闪念过的私心。“要斗私批修”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盛行的风潮，我从小学到中学，有过无数次的亲身经历和体会，对于那些“狠斗私字一闪念”的空话、套话，早已司空见惯。但这一次，我真是深深地为两位先生无情解剖自我的勇气所折服，由此执着地认定他们都是好人。

许多年来，我多次和同事们说起此事，为自己有幸参加这次会议而感到高兴。前一阵子在家和父亲闲聊，说起1973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宋尤袤刻本《文选》，才知道当时曾通过白化文先生向北京大学王重民先生求助，白先生转达王重民指示，到北图找他的两个学生帮忙，这两个人正是丁瑜和徐自强先生。《文选》的影印出版，应有他们的一份功劳。

1985年底，善本组办公室由中通道搬到1号楼前厅的西南角，古籍善本总目办公室也搬到隔壁朝西的房间。由此，善本组年轻员工与做古籍善本总目工作的几位先生的接触稍稍多了起来。三位先生时常进善本组办公室来查阅善本编目草片或分类卡片目录，丁先生每次来去都是轻手轻脚，遇见我们年轻人，虽然说话很少，但总是含笑微微点头，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每当我们问丁先生是否需要帮忙时，他都微笑着说：“不用，不用，我自己来，你们忙你们的。”但如果是遇见王玉良先生，丁先生往往就会主动与他交谈上几句。由此我知道，丁先生与王玉良先生的关系极好。

1988年，善本特藏部由北海老馆搬迁至白石桥新馆。“全国古籍善本总目”办公室先于善本组搬迁，善本总目办公室里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集部书的目录卡片（另有很多经部、丛部的卡片），数量很大，目录柜有七、八个之多，我看到冀淑英、丁瑜、陈杏珍等先生都在紧张地整理杂物，捆绑工具书和目录卡片，非常忙碌。三位先生中，陈杏珍虽然年纪最轻，但身体不好，诸如捆箱等重一些的活儿，丁先生都抢着干，累得他满头大汗。善本组年轻人对善本总目及冀淑英、

丁瑜、陈杏珍先生一向高仰，见此情形，立即组织人员前去帮忙。李际宁负责挪柜，并帮着我装箱、捆箱；陈红彦、胡谦、傅敏帮着捆工具书，并负责把目录卡片从目录屉中取出，穿线捆绑；拓晓堂、张胜利负责各类箱、柜、家具的转运。大家干得热火朝天，好像只有两天工夫，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完了。冀淑英和丁瑜先生身为著名古籍版本专家，而且都早已过了退休的年龄，但在搬迁过程中，他们却不失图书馆员“勤杂工”的本色，着实令人钦敬。

二十世纪90年代初，《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主编顾廷龙先生来北京，居住在地处北苑航空城的儿子顾诵芬家里，我曾去家中探望。后来善本总目的几位先生去看望顾老，好几次都由我带路，指引馆里司机开到北苑。总目的编委会，有两回是在顾老家中开的，中午大家就在顾老家中吃饭。我一个局外的年轻人，有幸旁听了总目的编委会。印象中，会议没有开场白式的套话，先由冀淑英先生汇报总目工作进展情况，然后就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讨论，冀淑英、沈燮元、丁瑜、陈杏珍依次发言，大家畅所欲言，各自说出自己的想法。丁先生本性谦逊，不很善于表达，他的发言一般总是最短，说完之后，就静静地听大家说，顾老有问则答，否则基本不再说话了。相对而言，沈燮元先生说话比较自如，发言也稍长一些。顾老就大家的问题说了自己的看法，并提出要加快工作的进度。会议的具体内容全忘记了，但和谐的气氛给我印象极深。在此前后，我参加过不少图书馆的古籍会议，尤其是中文古籍机读目录格式的讨论会，见过持不同意见的几方争论得不可开交的场面，每每这个时候，就会联想起那次总目的编委会议。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是国家现藏古籍善本书的总目录，它对于古籍版本的鉴别以及古籍的整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然而，这样一部大型书目的产生，实在是太不容易。按我个人的看法，如果不是深受广大人民爱戴的周恩来总理1975年于病床上提出“要尽快把全国善本书总目录编出来”，外加遇上改革开放之初那个全民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好时期，这个“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录”是不可能编制出来的。因此，我从心底里敬重所有参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纂工作的人员。

沈津先生在《延年集序》中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从编纂到出版费时十

八年之久，完整经历初审、复审、定稿工作的总共九人，这些人为《全国古籍善本总目》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此我深有同感，《全国古籍善本总目》编纂委员会属于临时性机构，实际参与此项工作的单位、人员众多，而项目完成以后，机构、人员也自然撤销、解散。但编委会所有人员当年在艰苦条件下奋力工作的情况，应该有文字记述下来才是，这段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不应任其湮灭。<sup>1</sup>

大致在 2001 年冀淑英先生去世以后，我就不断地怂恿丁瑜和沈燮元先生撰写回忆总目工作的文章，我甚至以这样的理由胁迫二老：如果您二位亲历编纂全过程的人不写，就有可能造成总目编纂工作部分历史的消失。二位老先生虽然认可我的观点，但他们做事谨慎，都没有贸然下笔。丁先生曾这样回答我（大意）：“回忆历史必须与事实相符，我担心一言不慎，造成误解。先等等吧，或许哪天我心绪到了，再写。”2019 年春节前，我和古籍馆馆长陈红彦、善本组组长李坚去看望丁先生，又说起回忆总目的事儿，丁先生说：“我现在思路差了，你们动员沈燮元先生写吧，我可以帮着补充一些回忆。”2019 年 5 月下旬，我受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指派，由冯坤博士陪同，和上海图书馆郭立暄先生一起前往镇江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核查古籍版本，见到沈燮元先生，说起丁先生希望沈老撰写回忆总目文章的事情，沈先生高兴地说：“找机会和丁瑜先生见面，两人一起回忆总目的情况，可以相互补充、印证。”

二十世纪 80 年代，北京图书馆及各个部门有逢年过节看望、慰问退休老员工的传统。我进入善本组工作以后，除在组长王玉良先生指导下学做各项业务，还经常跟随他四处去老同志的家里探望，我们一起去过赵万里、陈恩惠、许汉中、范惠芳、马侗瑾等人的家。丁瑜先生家的老宅在延年胡同，我随王玉良先生几乎每年都去，而且平常的日子，也去过很多回。每次去，往往会交谈很久。我就是通过二老的谈话，知道了一些善本部的往事。也因为这些个的缘故，我和丁先生的关系也日渐亲密起来。

前不久读到赵宣先生所著《口述史视阈下的古籍版本鉴定研究》，其中介绍丁瑜先生时，说我与丁先生亦师亦友，这显然不太准确，其实丁先生和我就是前

<sup>1</sup> 参见秦晓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纂史研究》，《山东图书馆学刊》2020 年 2 期；韩锡铎《中国古籍版本学破天荒的评论著作》，《图书馆学刊》2019 年 2 期。

辈先生与晚辈同事间的关系。但不得不说，丁先生对我确实很好。大概2012年秋季的一个下午，我因颈椎、腰椎难受，去医务室拿药，偶遇丁瑜先生由女儿丁欣陪着也来馆里报销医药费，丁先生见我身体不适，问明病情，嘱咐我好好休养，并告诉我有一种比较对症的药膏可以试试。哪知分别约一小时左右，丁先生竟拿着水果和刚刚他介绍的那种好用的药膏出现在我的办公室，当时我真是惊慌失措，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因为丁瑜先生的缘故，我参与了三部书稿的编辑与整理。第一部文稿是施廷镛编著的《丛书综合目录》（即《中国丛书综录续编》）。施廷镛先生是图书馆学界的老前辈，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曾司职于燕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等多个单位，著述很多。

《丛书综合目录》为施廷镛先生生前所著，然而属于未完稿。1994年，施廷镛长子施锐先生与齐鲁书社签订该书出版合同，后因内容与《中国丛书综录》雷同较多而被退稿，随后又联系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参照《中国丛书综录》的编辑体例，《丛书综合目录》书后应附有四角号码丛书书名索引及丛书子目索引。因熟悉四角号码的人相对较少，施锐先生请丁瑜先生帮忙。丁先生经与王玉良先生相商，得知我之前曾摸索过四角号码输入法，编辑四角号码索引不太费劲，便嘱咐我尽量帮施先生的忙。

施锐先生来图书馆找我，不只要我编索引，还希望我能审理书稿。经查原稿，很多丛书只有总名，缺少子目；还有些书，缺失编纂者，甚至有未列版本的现象。很显然，像这类内容有待完善的稿子，还不具备编制索引的基本条件。我向施锐先生说明原因，意图回绝。施先生见我退缩，焦急地说：“我已70多了，就想完成这个事。我有血压高，着不了急，请帮帮忙吧！”见施先生心情如此急迫，我勉强答应只编索引，但审稿的重任则不敢担当。不料，施先生见我答应下来，又拿出一段文字，叫试着标点，挑明说要“看看你的水平”。我当时真是大臊，但碍于丁、王两位先生的情面，还是努力标点了。后来看到《〈中国古籍版本概要〉的标点文字错误》（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9年1期）一文，才理解施锐先生为什么会向我提出那样的要求。

有些始料不及的是，这部书稿花了我约半年的业余时间。因为书中有大量的条目需要补充丛书子目，多亏组里同事唱春莲老师出手相助，帮我打字输入了很多补充的丛书子目，否则会花费更长的时间。编制索引时，施锐先生又提出需增编子目分类索引，这等于是给丛书所有的子目进行分类，大大增加了工作的繁琐和难度。

2003年，这部书稿改名《中国丛书综录续编》，终于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但书名更改得不够恰当，因为其中有不少内容已见于《中国丛书综录》，“续编”的称谓显然名实不符。施廷镛先生对古代丛书深有研究，其原作《丛书综合目录》的编撰早于《中国丛书综录》，二书内容有所重复，应予以理解。

第二部是王雨先生的文稿。王雨字子霖，早年在琉璃厂经营藻玉堂，与众多知名学者、藏书家及图书馆相交往，蜚声于京都古书业。1936年抗日战争前夕，他介绍山东海源阁主人杨敬夫将残阁遗存的几十种宋元珍本以8万银元抵押于天津盐业银行。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由当时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主持，将这些珍贵书籍全部赎出，拨交给国立北平图书馆典藏。这是王雨先生为保护国家珍贵古籍做出的重要贡献。

已故历史博物馆文物专家史树青先生早年就读辅仁大学时，就听余嘉锡、赵万里二位先生讲，王子霖是琉璃厂有见识的通人，曾为梁启超先生所称道。二十世纪60年代初期，王子霖曾受聘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学术委员会顾问，并在历史博物馆讲授过古籍目录与版本的课程，史树青先生即是当年的听课人之一。

大约2001年，王雨先生的孙女王书燕女士为出版祖父的文集，找到中国历史博物馆，朱凤瀚馆长予以热情接待。史树青先生得知出版王雨文集需找熟悉古籍版本目录的人帮助整理时，给予了特殊的关心，他特地找到常与自己一起参与文物鉴定活动的好友丁瑜先生说：“请你一定要帮帮她，就把这个事情承下来吧。”丁先生当时年事已高，无力亲为，便向王玉良先生说明情况，请他把这个事情承下来。王玉良先生1996年退休后，一直在位于六部口的北京文史馆帮着管理图书资料，还承担了馆属刊物《北京文史》的编辑和稿件审校的任务，馀暇不多，便打电话召我去北京文史馆，命我把这个事情承担下来。我素知史树青、丁瑜、

王玉良相互间的笃好关系，今见几位先生以同样的话语相递重托，便打消原本想要拒绝的念头，承应努力去做，并请唱春莲老师和我共同做这个事。

王雨文稿分为《古籍版本学》《古籍善本经眼录》《日记、信札及其他》三部分，总名《王子霖古籍版本学文集》。其中《古籍善本经眼录》内容为王雨先生平生经眼善本古籍的记录，排序比较凌乱。原稿皆以毛笔所书，字迹比较潦草，文字辨识困难较大。好在其中很多的书籍已收归我馆，需要时可以查看原书。对于本书的整理，唱春莲老师花费的精力比我多。我们主要结合有关书目，对书名、作者、版本等各项内容一一核检；依据古籍著录的规范，补充完善各个项目；对提要性的文字，添加标点。整理完成后，王玉良先生又对书稿做了最终的审校。至于《古籍善本经眼录》的书名，也是王玉良先生和我一起拟定的。

值得一提的是，《古籍善本经眼录》中附有袁克文 1915—1918 年日记中的购书记录，实为研究珍本古籍流传极其重要的资料。王玉良先生看到这部分文字，非常的重视与兴奋，他认真予以整理，并在《前言》中特别指出，若非王子霖先生有心摘抄，极有可能失传于世。

除此之外，我还审读了《古籍版本学》的校样，改正了少量的误字与疏失。如家刻本一节介绍《清平山堂话本》括号中的文字，就是我删改后添加上去的。

第三部整理的文稿即丁瑜先生的文集（《延年集》）。这是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和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交给善本组的任务。与前两次勉强参与文稿的整理不同，这一次我是愉快地接受了组里给我安排的任务。

我的任务之一是为收入文集的文章分类。学人出版文集是中国古代的传统，而古人文集大多是按类编排。丁瑜先生毕生与古籍打交道，编辑他的文集，当然宜于沿袭传统的类编方式。因此，我将丁先生历年所写文章依内容简单归为四类：a 综论版本、目录学的，b 具体研究、论述某部古籍的，c 序、跋的，d 纪念、杂忆的。这样做的目的，主要也是为了有一个大致的文章排列次序。

丁先生的论著有与肖振棠合撰的《古籍装订修补技术》。此书初写于 1964 至 1965 年，1978 年修订删改，1980 年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我初到善本组时，王大可副组长要求我学习的书籍中，就包括丁瑜先生的这本大作。当时我还听说，

此书出版之前，丁先生曾问序于人，但或认为其学术价值不高，或属于合作等原因，竟无人承应。这也导致丁先生本人很少向人提起自己的这部著作。而且，由于是合著，丁先生也不太愿意把这本书纳入其文集之中。

其实，《古籍装订修补技术》的学术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如其《后记》所言：编辑这样一本书，“为了使这项濒于灭绝的传统工艺得以保存”。“本书的作者之一，肖振棠同志已经是七十岁的老人，从事古旧书装订工作有着近五十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本小册子可以说是他五十年来工作的经验介绍。”丁瑜是富有实践经验的古籍版本目录专家（当年他一句“《永乐大典》栏线上下有针眼”，我谨记在心），肖振棠是人所公认、实打实的古籍修复专家，二人合著《古籍装订修补技术》的权威性，需要质疑吗？

近些年来，我们特别强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相关技艺的传承。《古籍装订修补技术》实属首次将古籍装帧修复工作的实际操作过程、经验用文字记录下来，为后人的研究与利用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这是丁瑜先生对古籍保护事业做出的具有开创性学术贡献。

按照古人的先例，个人的文集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即所谓只收部分著述的“文集”，常见的主要收诗歌、散文；一类即所谓的“全集”，不论类别，所有著述一概收入。丁先生已九十高龄，他的文集，当然宜于采用全集式的编法。因此，善本组及张志清副馆长等一致认为，文集收入《古籍装订修补技术》一书，更有利于人们了解丁瑜先生的学术成果及学术贡献。

《延年诗草》收入《延年集》，算是一种机缘。诗缘情，按丁瑜先生的性格，一般是不太愿意把表露内心情感的诗歌轻易发表出来的。或许是出版他的文集特别高兴，导致他下决心把自己珍藏的诗作拿出来一并出版。丁先生把《延年诗草》交给我时，非常认真的对我说：“你给看看，放在集子里行吗？我全听你的，你说了算。”同时一再叮嘱我不要给别人看。我为自己是《延年诗草》第一个读者而高兴，但由我来定夺丁先生的诗作是否适宜发表，则又深感责任重大。我当即非常郑重地向丁先生保证：“我一定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来评判您的诗作。志清喜欢诗，属于文学派，也请他看看吧，听听他的意见。只有我们两个人都认为可以，



才收进集子；如果两个人看法不一致，就作罢。”

《延年诗草》述及了一些往事，因而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这是志清副馆长和我比较看重的，也是我们力主把《延年诗草》收入文集的理由之一。丁先生的新诗写得很好，富有时代感，我们隐约看到了一个充满青春气息和活力的丁瑜先生。

清人张贞《半部稿》自序云：

“余文稿刻成，客有见者，曰：“此子半部稿邪？”余问其故。客曰：“古今之自集文，与集昔人之文者，必备诗赋、文章而后谓之全集。是编有文无诗，故知其半部也。”

按照这个标准，那么今人所出的文集，恐怕绝大多数只能算作“半部稿”，而丁瑜先生《延年集》文章、诗赋俱全，足堪“全集”之名了。

#### 【附记】

2020年6月16日下午约3点钟，我忽接陈红彦的电话，她语调沉痛地说，丁瑜先生今天下午约1点钟去世了。我万分惊讶，不敢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因为就在春节前，我曾两次去丁先生家中看望他，一次是得知丁先生身体不适，和李际宁到丁先生老宅延年胡同探望；一次是和陈红彦、李坚代表古籍馆和善本组同仁去里仁街图书馆宿舍给丁先生拜年。当时的丁先生，尚还精神矍铄，红光满面，与我们欢谈甚洽，并一再招呼我们吃水果，离别时，老先生一如既往，坚持送我们至门口，目送着我们离开。没想到，这竟成永诀。